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张晓晶 董昀 李广子 李俊成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本文力图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系统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金融工作始终围绕推进现代化这条主线展开，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从理论维度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经由“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开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其基本要义体现为“八个坚持”。从现实维度看，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现实逻辑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纵观世界千年金融史，中国早期的金融发展可圈可点；但近代以来的落后使得中国金融发展落入到“以西方为师、向西方合流”的窠臼。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张晓晶、王庆，2023）。**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苦苦探索现代化之路，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都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金融的

有力支撑。由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创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致力于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内嵌于现代化道路之中的金融发展道路，从而突破了此前的以西方为师、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回望来路，中国非但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老路，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配合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百余年来的实践探索表明，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晚清到民国，走的是以西方为师的道路，努力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经验“搬运”到中国来。但这种“西天取经”思路主导之下的各种移植并不成功。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的基础之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由此形成的金融发展道路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为世人惊叹的巨大成就。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开端，也是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步阶段，肩负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重任。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核心特征是**“推动形成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努力推动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军事斗争胜利和革命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胜利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¹与经济工作的步调相一致，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根据地经济和工农大众，通过**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创新货币供应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等手段，为根据地军民的生产活动注入了宝贵的资金血液，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出支撑革命胜利的经济力量。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

¹《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4页。

上包围的战略，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这就需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尽快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这一方面有利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避免受制于人，为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环境，奠定政治前提；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从 1953 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 1964 年着手推进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注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发展，以发展巩固国家安全。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特征是“为安全和发展服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契合的“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信贷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从而有力地动员分散在国民手中的资金等生产要素，来支持重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

具体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形成之后，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也相应形成。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金融体系高度简化。财政部门是计划体系中负责配置资金的部门，而金融部门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开展资金筹措和配

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这套“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建设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供了有力支撑。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借鉴各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成果，注重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体系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一个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资源的体制机制，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李扬等，2018）。这个极具说服力的金融故事彰显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巨大成就。

一方面，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赶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体现在政府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

(Arezki et al., 2017)²；以主导信贷配置方式加速了储蓄—投资转化；以政府兜底方式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发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素价格的市場化和资源配置的媒介化进程，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第一，长期被压抑的利率（即资金价格）随着市场化推进逐步得以纠正，使得广大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相应地持续提高。第二，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发展，推动金融资源的配置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为微观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第三，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也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起开始破冰。我们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由开放推动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促进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物随钱走”的机制引导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归根到底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一问题在金融领域广泛存在。因此，推进金融供给侧

²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多位学者对于中国开发性金融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便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简言之,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提出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避免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判断,明确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指明了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部署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新时代金融取得了重大成就: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强化,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机制和方式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平稳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一批重大金融改革举措平稳落地,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金融科技高速成长,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总之,金融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金融还将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迷思”：“落后”的金融何以创造“两大奇迹”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率先迈上了现代化征程，也最早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欧美学者基于本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理解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或许正是基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自信，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抱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偏见去评判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他们眼里，中国的金融体系无疑是落后的。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被人认为是“落后”的、“低级”的金融体系却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持续四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藉此助力“两大奇迹”的实现，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卓著，只不过在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框架中找不到破解中国金融成功之道的密码而已。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风靡全球的著名教科书《货币金融学》中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米什金，2022）。隐含于其中的“悖论”是，金融既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有悖常理，难以理解。这个令西方学者备感困惑的“悖论”无疑构成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中国金融发展究竟做对了什么？为何能够助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遇到过、西方金融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破解中国金融发展的理论迷思，提炼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指明了方向。

探究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必须要搞清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道路的形成机制，即业已形成的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二是道路的基本特色，即这条金融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以下两节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探索性回答。

（二）“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³这一重大判断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筑牢

³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第1版。

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道路根基。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同时又不断经由“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马克思主义是魂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魂脉”，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总结、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包含大量经济金融关系、货币、信用、资本及金融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特征和虚拟资本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到恩格斯对金融资本崛起现象的关注，再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银行、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行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学说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对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指导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层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

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要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基础的观点。二是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理论框架和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以及金融寡头行为规律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货币流通运行规律的分析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金融现象，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三类货币。一般而言，金属货币更多发挥价值贮藏作用；信用货币发挥支付手段职能；纸币则仅仅是流通手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货币是相互转换的。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货币都要求回到其耀眼的存在上去，即回到黄金。上述规律，如今依然适用。

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为后人的研究探索提供了范例。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历程，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金融理论、思潮、实践和制度的发展变化，注重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以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断总结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频发和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的深刻教训，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外来学说和经验的开放包容心态和科学严谨态度。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重大意义在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浩然丰富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为这条道路提供绵延不绝的丰厚滋养。

从货币金融实践层面看，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体系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货币制度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⁴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但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晰，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货币的职能、铸造方式、铸造技术、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⁵当代美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的研究（万志英，2016）也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存在与地中海和西亚等区域截然不同的特性。

从货币金融思想层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货币金融现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有些见解还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贡献。例如，《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或许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讨论，等等。凯恩斯在 1912 年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

⁴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 页。

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13 页。

就曾经感叹道：“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理论”。⁶

3. 关键在于魂脉和根脉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⁷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的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许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如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等，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提供了现实土壤。

正因为这些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互契合之处，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引领，才使得中华文明的上述宝贵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道路根基和独特优势。

⁶J. M. Keynes, 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The Economic Journal*, Dec., 1912, Vol. 22, No. 88 (Dec., 1912), pp. 584-588

⁷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党在探索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心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创造性开展金融工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三）“八个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化总结。仔细体会“八个坚持”，每一条都是“两个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

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⁸

1.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成功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金融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大者”，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把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确保我国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到改革开放时期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从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到第二个百年征程迈向共同富裕，金融发展始终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关键要素

⁸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主持》，《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第1版。

和有力支撑。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2.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核心任务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明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个核心任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发现，“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金融一旦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震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与其金融业的脱实向虚不无关系。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早已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辟论断。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名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就表明，货币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实体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易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本源。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重要论断，以及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肌体”与“血脉”的生动比喻表明，在经济与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金融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方面要以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程，就是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在金融工作中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服务实体经济不但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循环畅通，就不会出大问题。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进程中没有产生风险隐患，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

一手促发展,一手防风险,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做大蛋糕、积累资产,为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供充足的弹药。

3、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确保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至关重要。**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中国基于转型和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坚持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相较于西方所谓的“休克疗法”、“金融大爆炸”、“华盛顿共识”,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八个坚持”当中的后面四条,系统总结了新时代金融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就是要通过推进改革为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这一难题。这就要求金融业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以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为抓手推动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的结构调整，从而起到连接供求的桥梁和组织资源的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新时代的金融工作中，我们推动渐进开放，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对于产业、贸易的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渐进而审慎的，必要的资本管制是维护金融稳定 and 安全的“防火墙”。底线思维强化了风险意识。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

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现实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在新征程上,必须准确把握新的机遇,直面新的挑战,紧紧抓住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朝着金融强国目标砥砺前行,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一) 新时代新征程对中国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现实环境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继续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第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五篇大文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就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主要体现为：1)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尚未形成；2) 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还需要金融体系有力支持；3) 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还面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困难，还需加大对三农、小微等群体的金融支持；4) 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养老金缺口以及老年人口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给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5) 经济金融体系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数字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加剧，对数字金融发展提出新课题。面对上述问题，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稳住经济大盘，必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再加上人口达峰提前、人口老龄化加快、中美潜在技术脱钩等因素，未来中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也面临挑战。新形势下，必须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应对各种冲击因素，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从国内看，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使得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金融、财政、产业等多个领域的风险交织、叠加、转化，宏观杠杆率高企、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风险不容忽视。从国际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我国在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货币安全、数据安全、外汇储备及海外资产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潜在风险。面对风险挑战，必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着重强化重大风险领域和重大安全威胁的应对与处置，着重解决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市场配置效率不高、风险应对不当，金融开放潜在风险等问题，确保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

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⁹。

这六大体系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六大支柱(或要素)。从一国金融体系的构成来看，这六大支柱之间存在有机关联。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是“中枢”，是它们构成了金融运行的主体部分；金融调控体系与金融监管体系是“治理”，是影响金融运行的上层建筑；而金融基础设施是根基，是金融运行与治理的基石。仅就一般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体系而言，这六大支柱很全面了。但如果谈到现代金融体系的中国特色，则还需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价值取向。（见图 1）。事实上，正是价值取向决定了金融体系进而金融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而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金融治理模式方能确保我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

⁹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主持》，《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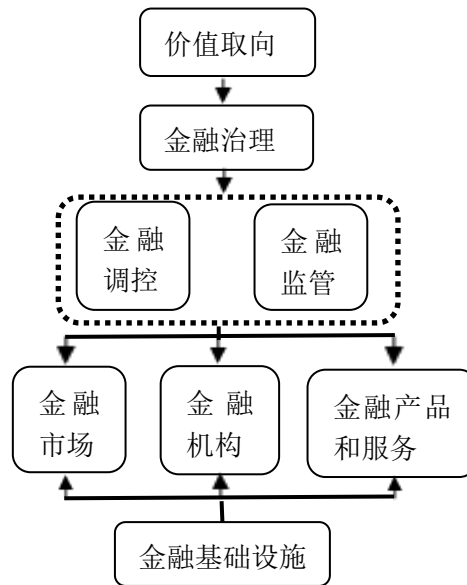


图 1 金融体系基本架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五大特征中，除第一点外，其它四点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目标。而所有这些目标，无论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和平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区别于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鲜明特色。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是党的宗旨决定的，核心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把增进民生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金融工作要能够“做大蛋糕”，促进财富积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因此，发挥金融业的资源动员与风险配置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财富、积累财富。

其次，金融工作还要能够“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一是要以金融手段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消除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减少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二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同时要规范金融科技发展，防止其可能产生的“阴暗面”。三是促进资本规范发展。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

2. 秩序与活力并重的现代金融治理

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决定了金融治理模式。现代金融治理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又要规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蛮生长。金融治理涉及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内容。

第一，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宏观调控是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一是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对于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要尽可能将实际利率与潜在经济增速和保持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同时，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二是要关注人口、技术和制度等中长期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张晓晶和汪勇（2023）的研究表明，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的影响后，“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而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要在考虑内外部因素变化基础上，兼顾稳定性增强与增长潜力提升，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三是要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在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功能的基础上，要注重打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发挥其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的作

用。四是要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利率是金融市场中最重要价格之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五是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导致市场主体预期转弱、风险偏好降低和信用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大规模使用政府财政手段扩大有效投资稳内需,又要通过货币金融环境的改善来降低融资成本(董昀, 2023)。

第二, 打造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长期以来, 非法金融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 并对正规金融活动造成冲击。要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 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 既要纠正“有照违章”, 也要打击“无证驾驶”。二是健全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 现阶段我国在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地方债等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较为突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 将会产生巨大的处置成本(Honohan and Klingebiel, 2003)。健全风险早期纠正机制有助于避免金融风险的扩大, 降低危机处置成本。要规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 增强市场约束; 筑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依法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 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

积极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发智能化风险分析工具，完善风险早期预警模块，增强风险监测前瞻性、穿透性、全面性，通过优化监管技术、方法和流程实现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三是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尽快推出《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区分常规风险、突发风险和重大风险，按照责任分工落实处置工作机制，合理运用各项处置措施和工具。四是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金融机构将消费者保护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中统筹谋划。推动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投诉受理渠道。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公平交易、信息安全等基本权利。

第三，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根本。**一是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2023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要发挥好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承担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要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此外，要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制，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二是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落实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宏观层面，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货币金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加强党中央及其经济金融工作部门对货币金融政策的评估督导，开展跟踪问效，增强政策贯彻落实的有效性；发挥制度优势，在决策和施策过程中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稳定市场信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大原则，健全国家安全部门与经济金融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及配合机制，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微观层面，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治理对于金融机构的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Carlini et al., 2020）。近段时期部分金融机构风险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治理失灵的结果，而公司治理失灵又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和从严治党不力有着直接关系。将党的领导融合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之中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应有之义。实际中，对于国有控股、非国有控股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不同的融合模式，包括把党建写入公司章程，将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进行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加强监管强化党的领导等。

3. 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伴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功能日益完善，金融市场间的协调性显著提高，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但还需看到，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的直接融资发展较为滞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不仅推高了全社会的杠杆水平，也使得创新创造活动难以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在持续扩张，但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开放度仍然不足，突出表现在资本项目开放不足、市场开放“碎片化”、金融类衍生品市场规模小而无法充分满足境外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求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均衡发展，也阻碍了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加快构建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需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首先，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优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架构，研究制定包括科技、绿色、数字等重点领域在内的专项信息披露指引，建立分层次、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安排，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二是统筹推进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制度创新，稳步扩大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范围，健全各层次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三是完善不同市场板块的差异定位，设立多元包容化上市

条件，推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满足不同层次科技企业融资需求，帮助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其次，加强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一是支持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两大交易所建立种类齐全、功能完备、结构合理、风险可控的健全的产品体系，推动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市场均衡健康发展，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公司债券、ETF、期权等产品创新。二是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破除阻碍金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升资金跨境融通便利化水平、创新数据自由流动新方式，加强境内外联动、本外币联动、离在岸联动、不同金融中心间联动，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水平。三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促进香港股票人民币计价交易，推动落实离岸国债期货的措施，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4. 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

自 Goldsmith (1969) 开创金融结构理论以来，尽管对于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还存在争议，但学术界对于金融结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已基本形成共识 (Boot and Thakor, 1997; 林毅夫和姜烨, 2006)。我国金融机构数量众多，不同类型金融机构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情况各异。以银行业为例，截至

2022 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法人金融机构 4599 家，不同银行资产规模差异巨大。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金融供求两方面特点要求，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要坚持差异化的发展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市场主体差异化金融需求。

第一，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一是提高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持续优化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效率；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架构，优化考核激励制度，提升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治理现代化水平；主动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提高国际化水平，对标国际先进金融机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金融机构。二是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不断完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对潜在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三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应当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金融资源供给，引导优质金融资源配置到上述领域。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利用好自身综合化经营优势，统筹用好各类金融资源，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综合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四是与中小金融机构实现错位竞争。国有大

型金融机构要在客户范围、区域布局等方面与中小金融机构实施错位发展，避免业务过度下沉对中小金融机构造成的挤压。

第二，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层级少、决策链条短，“软信息”¹⁰能够在中小金融机构内部有效传递（Berger and Udell, 2006），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本地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综合竞争能力较低，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立足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即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竞争力、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要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一是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结合本地金融需求特点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形成特色。二是对异地经营进行限制。从积极方面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异地经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本地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Emmons et al., 2004）、增加市场控制力（Deng and Elyasiani, 2008）、提升品牌形象等；从消极方面看，异地机构与总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金融机构通常很难对异地机构进行有效管理，由此增加的代理成本会对金融机构绩效造成损害（Brickley et al., 2003）。从我国情况看，异地经营总体上会对中小金融机构绩效造成一定损害（李广子，2014）。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小金融机构异地经营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¹⁰所谓的“软信息”是指那些不能被除信息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直接验证的信息。

第三，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一是突出政策性职能。

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回归主责主业，坚持“保本微利”原则；聚焦政策性业务本身，对商业性业务进行压缩；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分别考核，避免对商业性金融机构造成挤出。

二是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竞争力。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类似，政策性银行由政府持股，也面临所有者缺位问题和运营效率问题（陈森等，2012）。因此，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需要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的竞争力，其核心是要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提高政策性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发挥政策性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成本低等优势，将市场目标与政府目标有机结合，按照市场化原则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白钦先和郭纲，2000）。

四是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协同。政策性金融的特点使得其能够与商业性金融形成互补，弥补市场失灵。因此，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对商业性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一是要加强保险机构对重点领域的支持。过去一段时期，部分保险资金在运用过程中出现投资范围广、偏离主责主业并引发金融风险的情况。从未来情况看，保险业在机构定位上要回归主责主业，避免盲目扩张；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

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和支持保障力度，提供风险保障和长期稳定资金。二是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优化商业模式，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提供保险支持；做好风险减量服务，主动介入被保险标的风险管理，协助被保险人降低保险事故发生概率或减少事故损失程度，提高社会抗风险能力，降低社会风险成本。三是加强自身风险防控。引导保险机构坚持长期主义，持续稳健发展，持续深化培育合规文化，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五，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内在要求。一是支持头部机构做优做强。支持头部证券公司通过业务创新、集团化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竞争力；对标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形成若干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品牌，以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助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二是引导中小证券公司实现特色化发展。对于中小证券公司，要结合股东背景、区域优势等资源禀赋和专业能力做精做细，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头部机构实现错位发展，打造精品特色投资银行。

5. 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需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特别是要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专业性，满足投资者对金融资产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第一，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推动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要将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提升至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市场主体培育，以科创型、创新型、专精特新等企业为核心，逐步增加高收益债券市场供给；加强高收益债产品创新，发展信用保护工具，提高投资者参与高收益债券市场积极性。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保障体系。知识产权是科技企业最为重要的一种无形资产，发展知识产权融资对于满足科技企业融资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引，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权威机构，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交易、质押、处置等运营能力；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畅通知识产权交易和质物处置渠道。三是优化投贷联动模式。投贷联动是指金融机构以“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有助于提高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效率（廖岷和王鑫泽，2016）。应当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对于投资科技企业形成的股权资产，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适当降低其风险权重，减少对银行资本的消耗，提高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积极性。

第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丰富绿色信贷产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入力度，扩大绿色信贷规模；促进

我国绿色产业名录与国际接轨，完善绿色信贷评估体系。二是发展绿色债券。要加大对重点绿色企业和项目的培育，通过绿色担保机制对绿色债券提供额外增信，提高绿色债券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三是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借鉴国际经验，研究推动实施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险，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名录。四是发展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环境权益市场和碳金融市场，创新环境权益定价机制，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的创新途径；建立国际普遍适用的交易规则，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

第三，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引导各类慈善基金投入普惠金融领域。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大量资金进入慈善领域并纷纷成立各类基金会。慈善资金要求的回报率普遍不高，主要用于公益类用途，与普惠金融领域资金需求特点高度契合。要尽快制定慈善基金支持普惠金融指导意见，引导各类慈善资金投入普惠金融领域，拓展普惠金融资金来源。二是加强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要引导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手段对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等进行改造。三是完善农村“两权”抵押贷款配套措施。作为农民最主要的两项财产权利，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等“两权”抵押贷款配套措施对于解决农村金融领域有效抵押物不足、释放农村金融需求意义重大。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两权”价值评估办法，解决价值评估的公信力和标准化问题；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两权”流转市场，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

咨询等服务；探索由地方财政出资建立农村“两权”抵押贷款风险缓释机制。

第四，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在养老金金融领域。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为契机，围绕第三支柱的养老基金、理财等金融产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个性化金融需求。二是在养老服务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应加强不同类型养老服务场景建设，从各类客户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需求出发，围绕资产管理、融资、支付、咨询顾问、消费等领域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在养老产业金融领域。结合养老产业的金融需求特点，加强在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建设改造贷款等方面的产品创新。四是在金融服务中体现对老年群体的人文关怀。引导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适老化改造和创新，改进老年群体金融服务体验。

第五，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进行改造，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水平；结合机构实际情况推动金融机构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以技术手段改造风险管理流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二是发展数字人民币。首先，以数字人民币为抓手完善金融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引导农民、小微企业主等普惠群体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缩小与其他群体在物理网点等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

其次，要把数字人民币融入到更多金融业务场景，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三是以金融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金融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一种金融形态，二者相互赋能。要结合数字经济的金融需求特点，加大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四是防止数字金融的潜在阴暗面。数字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潜在的阴暗面，包括将大量低收入群体变成债务人、掠夺性信贷、数字鸿沟等；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对金融发展的自主性和金融安全带来挑战。因此，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高消费者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安全。

6.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所谓金融基础设施，是各类为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的总称。它既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也是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抓手，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建设一个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能够确保金融体系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在不利局面乃至极端情况下，仍可保障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当前，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存在支付清算隔绝、数据系统失能等潜在风险。首先，我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在服务器、信息通道乃至关键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受到外部条件制约，一旦支付清算功能受限，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势必极大受损。其次，世

界各国正围绕数据的存储和跨境流通的治理规则展开激烈博弈，数据治理规则体系建设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为了提高自主性**，要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深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架构转型，解决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卡脖子”问题，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为了提高可控性**，要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完善极端情况下重要资源的支付清算备份系统。同时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监管立法工作，健全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规则以及对金融基础设施跨境行为的监管细则等，把握国际金融监管主导权，防范外部风险。**第三，为了提高安全性**，要提升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特别是要强化参与者数量多、市场占有率高、业务关联性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应急处理机制和灾难备份机制建设，显著增强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韧性。**第四，为了提高效率**，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登记、清算、交易、支付、征信等各类基础设施的协同性，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在支付结算、登记托管、征信评级、数据库建设等领域推广数字技术的应用，以高质量金融“新基建”更好适应金融业发展新要求。

五、结语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篇章的一条鲜明主线。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奋力开拓出来的，是一条尊重金融发展规律，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成就卓著的，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当时推进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来制定金融工作方针，为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难题提供有效手段，助力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各个时期的目标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推进现代化这条主线展开，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是这条道路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受其浸润滋养的当代中国实际是这条道路的根脉，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结合（即“两个结合”）筑牢了这条道路的根基，使其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八个坚持”上。首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基本立场。第二，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构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大核心任务。第三，基于经济发展和体

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努力实现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就必须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现实逻辑是,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展望未来,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在金融强国建设实践中,我们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 and 金融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经济 and 金融高质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金融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继续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讲好金融发展的中国故事,破解中国金融发展

的迷思，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理论创新发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白钦先、郭纲（2000）：《关于我国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再探索》，《财贸经济》，第 10 期。

陈森、袁乐平、贾健（2012）：《中国政策性银行国家补贴依赖程度测算》，《金融研究》，第 11 期。

董昀（2023）：《论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1 期。

李广子（2014）：《跨区经营与中小银行绩效》，《世界经济》，第 11 期。

李扬、刘世锦、何德旭等（2018）：《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学动态》，第 11 期。

廖岷、王鑫泽（2016）：《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机制创新与监管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 11 期。

林毅夫、姜烨（2006）：《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 1 期。

马克斯·韦伯（2018）：《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米什金（2022）：《货币金融学》（第十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彭信威（2020）：《中国货币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万志英（2016）：《剑桥中国经济史：从古代到 19 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习近平（2023）：《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第 17 期。

张晓晶、王庆（2023）：《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经济研究》，第 2 期。

张晓晶、汪勇（2023）：《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主持》，《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人民日报》2023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Arezki, R., P. Bolton, S. Peters, F. Samama, and J. Stiglitz (2017): “From Global Savings Glut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Policy*, 32(90),221-261.

Berger, A., and G. Udell (2006):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11), 2945-2966.

Boot, A., and A. Thakor (1997): “Financial System Architectur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0(3), 693-733.

Brickley, J., J. Linck, and C. Smith (2003): “Boundaries of the Firm: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0(3), 351-383.

Carlini, F., D. Cucinelli, D. Previtali, and M. Gaia Soana (2020): “Don’t Talk Too Bad!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New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21, 105962.

Emmons, W., R. Gilbert, and T. Yeager (2004): “Reducing the Risk at Small Community Banks: Is It Size or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that Matt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5(2-3), 259-281.

Deng, S., and E. Elyasiani (2008):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Bank Holding Company Value, and Risk”,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0(6), 1217-1238.

Goldsmith, R.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nohan, P., and D. Klingebiel (2003): “The Fiscal Cost Implications of an Accommodating Approach to Banking Cris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7(8), 1539-1560.

Keynes, J.M. (1912): “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The Economic Journal*, 22(88), 584-588.